

THE NEW BANNER

新旗

第二十一期

發行所
香港太古船塢李振聲

每本基本價銀兩角

目錄

不要讓歷史重演
中共在北平表演了甚麼
從天津某工廠透視
共產黨底工人政策
我們的和平條件
經濟恐慌與工人鬥爭
中共軍事勝利的原因與意義
內戰與革命
中國革命悲劇(續)
我們的政治主張

木君 月牙
舒嚴 連根
林原 嚴鳳岡
舒嚴 唐盛譯

不要讓歷史重演！

木君

民國史上出了兩個梟雄：袁世凱與蔣介石。無論在性格，作風；見解，甚至命運上說，二人都是頗相彷彿的，雖然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不同：前者主要代表了清朝餘孽及其背境封建式的大地主與大官僚，而後者首先代表着中國的財政買辦資產階級。

那二人的比較研究已經習見了，尤其是關於他們專橫的性格與狂妄的虛榮方面。這方面的研究是有趣的，因為他們的相似點實在太過顯著，同時他們的悲喜劇式的命運也太過相像。一個是『百日皇帝』，另一位是『半年總統』；一個是至尊的寶座未暖，另一位則元首的印綬初握，便都先後輝映地被送下臺來的。歷史雖然是時常重演，却不料如此雷同的一齣『萬歲夢』，竟一再演出於三十年的短時期內。

不過，我們並無意於研究問題的『戲劇性』方面。

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乃是二位『巨人』被逐下台後，那種新局勢的相似。前者，蔡松坡在雲南起義，各省響應，帝制取消了，然後大皇帝『駕崩』，民國因而『重光』，可是，國家的一切都仍舊貫例，全部的政權依然操在與袁世凱同一階級立場的北洋軍閥手裏。『獨夫』去了，共和萬歲，但是工農大眾的命運絲毫未變，國家

與社會的種種制度也絲毫未變。古老的中國仍然陷在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的肆無忌憚的榨取與壓迫之中。

現在，新的『獨夫』走了，在廣大羣衆的不滿與農民的武裝鬥爭的打擊之下，這位新的洪憲皇帝並未崩殂，祇是移蹕故里，暫作休假。他還保持着百萬大軍，還保持着整個的壓迫機構，並且還控制着最大部分的國家財源，還享有着目前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暗中支援，可是，我們已聽見響徹全國的妥協呼聲，看見了各種勢力的和平合作。並且還看見了那個站在反國民黨勢力頭上的中共竭力鎮壓工農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的行爲，他們已經在高呼法律與秩序了，如此下去，那末蔣介石個人雖然下台，而蔣介石所代表的勢力——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資產階級與地主，却不但會繼續存在，而且會鞏固強大的。同時不但蔣介石的勢力如此，而且蔣介石本人，也會捲土重來的。

袁世凱死後，我們曾遭遇了長期的軍閥混戰與其他數不清的災難，現在蔣介石下台了，我們是否願意歷史在這方面也再重演呢？自然，沒有一個人願意苦難重營的。但是如何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如何才能給中國的歷史創造全新的一頁？那末我們必須認爲如此辦：

(一) 徹底打倒國民黨的一切勢力，不與任何舊勢力作任何妥

- 協；
 - (二) 徹底推翻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富農；
 - (三) 徹底消滅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
 - (四) 徹底發動工人與貧農的鬥爭，並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
 - (五) 以各級代表會議為基礎，進行真正平等直接全權制憲會議的普選，並由此組織工農政府，解決一切革命問題。
- 總之，只有放胆而徹底地讓工農起來，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政綱而鬥爭，才能使蔣介石不致重來，國民黨不致復存，一切勢力無所容身，悲慘的舊歷史不致重演！

二月五日

中共在北平表演了什麼？ 月牙

北平的局勢和平，中共譽為應當受到贊美的一件重要工作。自然，在革命的進程中，能夠把統治階級的軍隊（部份或全部），打擊得不戰而降，那當然是值得贊美的。不過這次北平的不戰而降，是在甚麼情形之下形成的呢？革命不單只要瓦解統治階級的軍隊，更重要的還要積極摧毀統治階級的政權及其社會基礎，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代替被摧毀了的政權。

傅作義的部隊，自從天津失守之後，已經不堪再戰，這是事實。但是促成他不戰而降的，並不是由於士兵的譁變——熱辣辣的革命意識的感染——，而是統治階級本身人士的妥協求和。這當中的奧秘是很明白的：(一)中共在瀋陽、濟南、天津等大城市的絕對保障私有財產制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二)中共只是實行聯合政府的新民主主義，而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三)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無能，已完全喪失信任，所以他們寧願投靠中共，以維持他們的生命財產，和他們的社會秩序了。

雖然，統治階級人士的看法是十分正確的，從十三條協議，以至中共所散發的傳單標語和佈告上，都充分的揭露了中共「革命」的實質：保護私人財產及私人資本（外僑生命財產也不例外），保證承認國營工廠、銀行、及公用事業中的商股，並曉諭全體人民各安本業，勿相驚擾，且必須負起維持秩序、治安、及法律的責任。

很奇怪！馬克思、列寧曾不止一次肯定的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私有制，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國家機器，不能簡單的握取它，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現在，中共張着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進行「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達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為新民主主義而奮鬥」（見北平人民日報發刊辭）的「人民革命」，却不去打碎，摧毀現成的私有社會制，及其國家機器，既不資產階級的代表郭宗汾、周北峯、焦實齋等成立聯合辦事處，又要全體人民負起維持現成社會的秩序、治安、及其法律的責任，這不是滑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大稽麼？

列寧又曾肯定的說，誰僅僅承認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現在中共承認了階級鬥爭，但却輕輕的把「聯合政府」、「人民政府」，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是一件可以忽視的小事了。中共為甚麼這樣幹呢？無他，它所需的工人階級，無產階級領導，却到處都對它冷淡，觀望形同陌生的人。於是乎「……而爭取到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專政，北平要達到這標的，尚有一些時期」（同上日報）。為甚麼呢？因為「要使羣衆組織體積日漸擴大，並為積極份子掌握」（同上日報）；就是說，自上而下的製造無產階級領導，還要一些時候呀！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既遠離了無產階級，就轉身來與資產階級攜手。

從天津某工廠透視

共產黨底工人政策

舒巖

近來接二連三發生了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大事變，使讀報的人應接不暇，可是在這些大事變中有一件小新聞，普通的人也許不很注意，但對於我們工人則是很觸目的，在我們看來，牠的意義比較那些大事變恐怕還更重大些。這就是二月二日上海某些報紙發表的聯合社二月一日的北平電報：

「天津來客談稱，共軍管制下的天津，一部分工人行動不檢，自取其咎。某工廠工人搗毀餐廳，家俱與廚房，然後向共軍官

員申訴，謂每日須工作八小時，所得工資極微。該官員當場以手諭蓋印交與來人，規定每日工作十小時，工資減低百分之二十。工人為之愕然。」

這個電報雖然用文言譯成的，仍能給我們一幅生動的畫圖。我們好像親眼看見大都市的工人，於解放軍入城後如何歡欣鼓舞，認為從此可以翻身了，認為從此可以解除資本家的榨取了，至少可以改善工作條件了。他們聯合起來，向資本家提出要求，目的達不到後就直接行動起來，其中難免損壞了若干與直接生產無關的設備。工人們很天真地以為共產黨官員是保護工人利益的，是一定同情工人要求的，是要幫助工人實現鬥爭目的的。可是，結果，出於工人意料之外，共產黨官員毫不考慮地下命令將原來的八小時工作增加為十小時，將原來極微少的工資再打個八折。不僅沒有幫助工人達到所要求的目的，反而幫助資本家加重剝削和榨取。於是工人「愕然」了。

以無產階級代表自命為共產黨，為甚麼不幫助工人，反而幫助資本家呢？直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我們在南方尚未解放的城市裏，讀了這個消息，也許會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通訊社故意造謠，故意誣蔑中國共產黨。或者根本上天津未曾發生這件事情，或者有這件事情發生，但共產黨官員是命令將原來十小時的工作縮短為八小時；將原來的微少工資增加二成的。

如果我們沒有同時讀到共產黨的祕密宣傳品，沒有知道共產黨的「工商業政策」，沒有曉得共產黨公開標榜的對於工資和工會的立場，那也許會有上面的想法。可是現在，我們想來，這聯合社的報道不見得是造謠的，因為天津共產黨官員的實踐恰恰符合於共產黨最高機關的理論。

對於工人，共產黨的理論首先要工人改變工作態度的，換一句話說即要工人首先努力生產，不僅替公營的產業努力生產，而且替私人資本家底產業努力生產。共產黨官員的實踐自然要符合這個理論，因此看見某工廠工人原來每日只做八小時工作，自然要延長這個時間至於十小時。我們相信這個工廠工人不僅每日要多做兩個鐘頭工作而已，並且在工作時間中還要比以前更加緊張多倍。



北極刻

都同孔祥熙宋子文一般，或者同小工廠的廠長經理一般，但我們知道共產黨底「工資政策」同「稅收政策」一般，是「工商業政策」的一部分，是為了好於民族資產階級而制定的，對於「高工資」的責斥，無疑不是為了怕工人受了農民及其他勞苦階級的妒忌，而是為了怕得罪民族資本家。與此理論相對應，則天津共產黨官員之減低工人工資是很可信的。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底下，工人也居然以

共產黨底理論其大是反對「高工資政策」。解放區有一部分天真的官員認為工人生活條件是應當改善的，因此曾將工資提至相當的高。可是現在這部分官員受了責斥，認為這樣做，不僅對工人沒有利益，反而「害」了工人，因為「高工資」會引起其他階級的人對於工人的妒忌。我們不知道這部分官員當初究竟將工資提到多高，是否使得每個工人生活

其經濟鬥爭迫使資本家作某種讓步了，例如生活指數。『生活指數』雖然是政府編製的，不符合於實際指數，但畢竟是資本家一枚眼中釘，非拔去不可。資本家常說，連美國也未嘗按生活指數發薪哩。共產黨始終不提生活指數，正如不提八小時工作制一般。天津工人按生活指數的極微工資活該要再打八折了。

『某工廠』廠工人鬥爭，是全天津工人鬥爭的象徵，而天津工人鬥爭又是解放後全國工人鬥爭底象徵。

我們工人需要一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黨，不僅在經濟鬥爭上，而且在政治鬥爭上，不僅在無產階級需要上，而且在全中國人民的需要上。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黨，然後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有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然後有真正的革命成功希望。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

(上接第十二頁) 以解放前的舊工資為基礎，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整。在這個基礎上實行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等和合理的與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以及分紅等類的累進工資獎勵制度。這裏，我們看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斥責的剝削手段，如計件工資制，分紅制等等都被人當作『正確的』工資政策了。社會主義未曾完成以前，工資制度還須沿用很久的時候，但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執了政的黨至少也應當廢除附加於基本工資制上的一些剝削手段罷？

這個『正確的工資政策』絕口不說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的制度。在現時的世界，連最富裕的美國，貨幣也不斷地貶值。所以通貨膨脹是不能避免的，只爭速度快慢罷了。生活指數雖然不是完滿的制度，雖然充其量不過使工人生活保持在做基數的那一年的水準，而不會變得更好些，但畢竟能夠保持這個水準。所以，在通貨膨脹之下，工人必須提出生活指數的要求。中國工人以其鬥爭已經獲得這個勝利品了，雖然國民黨官編的指數並不可靠，工人所得還是形式的多於實質的。但那是在國民黨統治底下。一旦『解放了』以後，工人要求的不是根本廢除指數，而工資按照個別情形『加以合理的與適當的調整』，而是保存指數，但由工會自己編製。除非將工人生活條件提高看做比生產增加還要重要的一種政權，才能拋

棄指數而另定工資標準。中共既然把『改變工作態度』列為第一，工人爲了保持一九三六年生活水準，就非爲指數制而鬥爭不可了。中共如果真地反對指數制而採用個別調整制，不管調整得如何『合理』和『適當』，總要爲工資問題與工人處於對立狀態的。上海已經有些資本家，希望中共將來能比國民黨的社會局更有效力地恢復工人勞動紀律和取消生活指數了。

最後，陳伯達這篇文章顯然是寫給資本家看的，至少，『上海職業界協會』是爲了向資本家宣傳才重印這篇文章散發的。他爲了討好於資本家，不惜反對工人過去的勞動態度，不惜警告未來的過份工資，却不見他爲了討好工人去實斥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中共政權在資本家和工人中間並非無所偏袒的。

毛澤東提出的中共工業政策有四句警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也可以讓我們做出同樣的結論。

正因爲中共已經形成了拿破侖主義的政權，要在資本家和工人兩個階級之間做仲裁者，而非明白而堅決地站在工人利益方面，所以害怕羣衆運動，牠不敢將此次內戰勝利轉變爲革命，爲真正的革命，即不敢藉城市工人羣衆的力量以推翻國民黨的政權。

真正的革命者應當知道現在努力的方向了。反動的國民黨二十年的統治就要崩潰了。雖然不是城市工人起來推翻牠，我們至少要使牠的崩潰成爲全國勞苦羣衆一致奮起之信號。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

列寧逝世五週年紀念日

鳴謝

下列幾位朋友的熱心捐助，使本刊得以繼續出版：特此鳴謝。

- 戴澤先生 四十元 木兄 十元
- 周遠先生 四十元 劉允之先生 白報紙二令
- 陳大中先生 三十元 沈女士 一千元
- 趙先生 一元 周阿大先生 三百元
- 李先生 三十元 陸根弟先生 五百元
- 雷女士 二十元 陳銀妹女士 一百元
- 沈毅先生 十元 張洪聲先生 二百元

我們的和平條件

連根

和平成了今日中國政治中最普遍的聲音。利用着工農兵士們的真誠願望，各類政治集團提出了各自利己的和平號召。因此甚麼都爲了和平，甚麼都舉了和平之名而行。和平成了一切卑鄙齷齪反動陰謀的護符，成了任何勾心鬥角的政治活動的盾牌。我們工農兵士大衆的和平願望是被強姦了。

爲此，我們站在無產階級以及一切勞動者的利益上，必須對和平問題作一番研究，並提出我們的『條件』。

首先我們要談到蔣介石及其一黨的和平。這是一個淫蕩婦喪失了一切迷人姿色之後所叫喊的真節！其惡心，其醜陋，其無耻，真是打破了歷史上『禮義廉恥』的記錄，以致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和和平呼籲中能含有一絲一毫的真誠了。牠祇能博得人們的唾棄，人們的輕視，人們的譏笑。所以對於這個坐在『總統』寶座上的上海白相人的和平，我們毋須費甚麼筆墨去揭穿牠的虛偽。

其他形形色色諸小黨派或個人所提出的和平辦法，不是國民黨所授意宣傳，配合蔣介石的號召，便是旨在招搖撞騙，投機取巧，以爲這些無聊政客本人晉身與出山之資，其無一談價值，也是顯而易見的。

值得我們研究的只有中共提出的『民主和平』。針對着蔣介石的元旦文告，中共領袖毛澤東在一月十四日聲明，提出了八點和平條件。這聲明自然與蔣介石的文告不同，充分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且博得了極大多數人的同情與信仰。人們之對牠注意，因爲牠是與國民黨從事和平買賣的討價還價，而人們之對牠同情信仰，則因爲牠包含了動人的要求，引得起飢渴人們的憧憬與期望。

我們這兒不將關心於和平買賣的進行與前途，我們這裏感到興趣的在於毛澤東所提出的和平條件的內容，我們要看牠們是否能給我們工農大衆帶來真正與持久的和平。毛澤東的條件完全符合於中共倡導的『新民主主義』，其基本的方向仍舊是要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對於這些根本思想，我們在過去許多文字中批評過了，牠不能有利於真正中國工農大衆的革命，我們也曾一再說過了，

這裏我們不再重覆。現在我們要站在政策的觀點上，具體分析那八點中所包含的意見，看牠是否能走向真正有利於革命的和平。

廢除偽憲法偽法統的要求是對的。如果國民黨如此強姦民意與如此橫暴無恥的法統都任其存續，那末任何和平都是沒有價值的。撕去這些醜惡的東西，自是『全國人民的公意』，但是『懲辦戰爭罪犯』這個要求却使上述的『廢除』成爲空話了。因爲『除非整個國民黨被徹底摧毀，偽憲法與偽法統之廢除便完全是形式的。』『懲辦戰爭罪犯』，表面看來是一個堅決而徹底的行動，而實則是十分虛偽的。將一個反動統治，反動政黨與反動階級的罪惡加諸於幾個——即令是幾十個『戰犯』身上，乃是這次戰後『民主』帝國主義者新發明的大陰謀。紐綸堡的老把戲我們見過了，東京的新花樣我們也看見了，幾個『大英雄』的處刑，僅僅是帝國主義欺騙民衆，同時又是明目張胆扶助反動勢力的最好的煙幕。在懲辦戰犯的掩護下，資本制度，乃至牠的最惡毒的表現——納粹主義與軍國主義，被全盤保存下來了。

反動的國民黨統治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與資產階級，也將同樣把戲下被保存着。

所以我們不要簡單的『懲辦戰犯』，而是要打倒整個的國民黨統治，且要掘毀牠的全部基礎——地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因爲祇有這樣，才能避免對工農的鎮壓戰爭之重演，祇有這樣，才能保證真正的國內和平而非國內戰爭。

可是根據毛澤東的聲明：『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就可以進行和談了，這十分不徹底的，因而十分虛偽的主張。根據這個條件，祇要蔣介石自己率領其他被指爲戰犯的少數人，帶着海空軍避居台灣，同時命令那些同樣忠實於他的左翼，甚麼『和平老人』與『和平將軍』之類，與共產黨談和，並進而成立聯合政府，如此則不但國民黨的社會基礎——資本制度與地主制度仍舊存在，不但非『戰犯』領導的國民黨仍舊存在，甚至蔣介石及其一系統的反動國民黨也仍舊

存在的。

在『十分厲害的』所謂『懲辦戰犯』的要求後面，其實隱藏着如此妥協的內容！

不過有人會如此說：『承認非反動的國民黨為談判對手，並不能產生像你所說的妥協結果，因為依據其他條件，如：四，依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等等；就是要根本摧毀國民黨及其社會基礎的。同時如果根本不承認國民黨的任何一派為和談對手，事實上只是促成反動黨的大團結，並使內戰延長至無限長久，這無論對於民生或革命，都不是十分不利嗎？』

要回答這個反駁意見，我們首先得說明我們對內戰的一個基本態度，我們從來反對內戰，並非簡單地因為牠是內戰，而因為牠是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政黨，依靠着美帝國主義，進攻由史大林黨率領的農民武裝隊。所以我們反對內戰，並非主張雙方無條件休戰，並不叫雙方放下武器，而是要使革命起來打斷內戰，至少使反國民黨一方的戰爭變成革命，由此一方面打倒國民黨，另一方面拋棄史大林黨對反國民黨革命勢力所加的反動控制與錯誤領導。總之，我們是要以革命來代替內戰，並不想以單純的和平來結束內戰。但甚麼叫做以革命代替內戰呢？為甚麼史大林黨一邊的戰爭不能看成革命呢？我們在這篇文字裏不能詳細地解釋這兩個問題，但為了解釋其他有關的問題起見，我們又不能不約略加以解釋。我們不把史大林黨一邊的戰爭看成革命，因為第一，史大林黨的政策在種種方面都限制着暴動起來的農民去觸動財產關係，（如果沒有這個限制，農民在這方面會走得遠得多）發展社會革命；第二，自來農民的暴動自身，尤其在目前時代，沒有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也總是不能在性質上生長至於革命規模的，換句話說，牠始終只能在舊社會的關係中打圈子。因此，抵抗着南京國民黨進攻的以暴動農民為基礎的史大林黨的軍事鬥爭，雖然帶有多少階級鬥爭的意義，因而必須使我們的同情與援助偏向着牠，但並未等於革命，而必須以革命去轉變牠或代替牠的。那末如何代替牠呢，曰，發動城市無產階級的鬥爭，與暴動的農民，尤其與貧雇農的鬥爭聯盟，實行革命，打倒國民黨資產階級，打倒地主富農，拋棄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特別

是史大林黨的妥協幻想，建立工農政府，以此實現工農解放及革命的和平。

根據我們這樣的內戰觀與和平觀，我們自然不贊成一般人誠心要求的所謂『以任何方式實現和平』，因為這是一個幻想，其所以為幻想之故，則因為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若不加以根本的毀壞，中國只能有不不斷的戰爭與混亂，絕不會有任何持久的，更不必說真正的和平可言。根據我們這樣的觀點，我們自然也不能贊成中共目前所提出的辦法，那個不徹底的，僅僅由中共取得了大部分政權而舊政制與舊社會仍舊保存的和平辦法。

不錯，毛澤東的條件裏提到了要改編軍隊，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以及廢除賣國條約。但這些都是空洞的，富有伸縮性的，因而充滿了欺騙性的。甚麼叫做『依據民主原則改編軍隊』呢？國民黨的軍隊是十分反動的，不但國民黨的，即使中共目前的軍隊，也離開民主的原則遠得很哩。絕對的自上而下，絕對的軍官統制，這使中共軍隊只有在數量上稍稍比國民黨的略近民主吧了。可是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為要造成一支真正為革命服務的軍隊，則必須首先解散常備軍，以工農民軍來代替牠，否則，一切『民主原則』的空話都不過替反動軍官團作掩護而已。

因此，為了真正的革命和平，我們必須提出：立即成立兵士委員會，解散一切常備軍，並進而組織工農民軍的要求。沒收官僚資本的要求本身是好的，但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必須絲毫不要造成人們對『民主資本家』的幻想，必須完全放棄『勞資兩利』的鬼話，必須堅決地號召工人組織工廠委員會，藉以監督或管理一切工廠，同時，被沒收的『官僚資本』必須嚴格地放在工人管理之下。

目前中共所提倡的所謂『沒收官僚資本』，僅僅是一方面準備造成新的官僚資本，另一方面企圖保護『非官僚』資本的利益，且用以更兇惡地榨取工人罷了。

以如此代價來換取和平，當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所謂改革土地制度，其要求本身自然也萬分正確。不過中共對於這個要求的態度，在目前已不是一個空洞的主張，而是有二十年的政績足資參考的了。二十年來中共在農村中活動的歷史，乃是一

部欺詐背信出爾反爾的歷史，牠時而反對地主，時而連絡地主，從無一定主張，一切根據牠對國民黨的關係以為轉移，一切隨從了蘇聯官僚的外交政策以為進退。遠的且不說，即依抗戰勝利內戰爆發以來的二年多的歷史看，也已充分暴露出牠在這方面的毫無定見了。牠最初擁護農村現狀，主張減租減息，旋即強迫一部分地主『自動捐獻』，以獎掖辦法進行土地改革；繼而開始清算分田，沒收地主土地，然後更進而反對富農，發展農村階級鬥爭，然此辦法又不旋踵地被放棄了，在『新解放區』且公開宣佈停止一九四七年雙十法令的實行，拼命聯絡農村中的地主富豪。如此反覆，如此不定，我們怎能相信爬上了部分政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以後的中共，更能徹底實行土改，籍以打擊反動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呢？

爲了真正的革命和平，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提出徹底與不變地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歸貧農！反對其他任何方式的所謂『民主的土地改革』。

至於廢除賣國條約，含義亦頗模糊。因爲在形式上，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都已廢除了，現在新締結的兩個主要條約，一個是中美商約，另一個是中蘇條約，形式上都是互惠的，而實質上都是帶有壓迫性的。所以我們不但主張取消前者，而且也要廢除後者。可是中共顯然把割讓旅大與保有中東路的中蘇條約認爲不是賣國的。

我們不能容忍中共這樣的偏頗。

不過此外，中共最近曾一再宣佈願意保護外國在華的工商業利益，即保護各帝國主義者在華從事經濟侵略的一切機構。如此而談甚麼廢除賣國條約，簡直是虛有其表了。因此，爲了真正消滅國內的戰亂之源，籍以確保真正的革命的和平，我們必須明白地提出：

經濟恐慌與工人鬥爭

戰後各國的復興工作，沒有一個國家真正能踏上繁榮的境地，都很快的就不得不又重蹈戰前軍火生產的瘋狂競賽中去了。中國不能擺脫這一個世界的厄運，同時它本身又處在一個遍地烽火的劫奪中，其恐慌的程度，自然要比其他各國悲慘多多了。所以農村的貧

打倒帝國主義，沒收帝國主義者在華工商利益，與各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至於賣國條約的廢除，則應該明白指出連中蘇條約亦在其內的。否則，這一響亮的要求，徒然一方面袒護蘇聯官僚的反動行爲，另一方面保護帝國主義的真實利益，並進一步與之相結託罷了。

目前美國帝國主義的陰險的旁觀態度，正是有鑒於中共的此一妥協面目而來的。

至此我們已經充分看到了，毛澤東提出的和平條件並不能造成有利於革命的和平，恰恰相反，牠只能給反動的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以及牠背後的美帝國主義，以一個喘息機會，以一個起死回生的方便，牠即使帶來了和平，也只有使中國人民在不很久的將來，再度嘗到戰爭的禍害罷了。

我們不要這樣一個腐敗，痛苦與陰險的和平。我們要一個與工農解放隨之俱來的真正的和平，一個革命的和平。爲此，我們的條件是：

- (一) 打倒整個國民黨統治；
 - (二) 否認國民黨一黨的憲法；
 - (三) 否認國民黨反動的法統；
 - (四) 成立兵士委員會，解散一切常備軍，成立工農民軍；
 - (五) 首先沒收官僚資本，由工人管理；
 - 成立工廠委員會，監督一切非官僚的工廠；
 - (六) 沒收土地歸貧農；
 - (七) 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利益，廢除一切新不平等條約，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 (八) 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代替一切舊有政權，同時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召集制憲會議，制定新憲法，成立工農政府，解決一切問題。
- 全國工人，貧農兵士與勞苦大眾們，起來爲我們的條件而鬥爭，以此實現真正的和平。

一月十七日

林原

困，城市的凋零，通貨膨脹的惡性化，物價騰漲的直線化，以及工人生活的惡劣化，就表現得更其驚人。

單就物價騰漲的情形來看，工人生活必需品中最主要的米油柴三項，在最近兩三箇月中，就跳躍得很難使人相信了。限價開放後

，白粳由二十多元一石一跳而為七八十元，再跳而為四五百元，更跳而為八百元左右。那一次跳動，不過是幾天功夫哩！這金銀存兌實施後，米價雖曾疲到三百五十元左右，但不到幾時，就在去年年尾的時候，又跳到六百多元，最近更跳到二千元左右，不過是半個月辰光，就跳漲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幾。這樣直線的騰漲，就連統治階級自己辦理的配給米價，也不得不跟着市價跑，要隨時調整了。一月初訂價每斗六十三元，不兩週就調整為一百四十元，漲起百分之一百二十。油價也是漲得驚人，由五角一斤一跳就是十三元，再跳就是二三十元，最近已跳到六七十元了。至於柴呢？也不甘示弱，就最近半個月來看，由一百多元一石一跳而為二百多元，再跳而為三百多元，這兩天又已突破四百大關了，幾乎是三五天一跳。其他物價也都向漲看齊。在這樣高物價重壓之下，工人們如何生活呢？

工人每月所得的工資，是按照統治階級所編訂的生活指數來計算的。統治階級是資本家的工具，他所編訂的指數自然不會對工人有利，往往要比實際物價低落一倍或一倍以上。最近二月份上半月的指數為四八·〇四倍，較上期十八·三倍漲起了百分之六十六。許多為資本家和統治階級所豢養的輿論家，都大叫與市價相差差不多了，企圖以此來討好工人。其實工人們在實際的生活中體驗得最為清楚，按照統治階級所編訂的生活指數得來的工資，已經很是可憐，加上資本家的折扣和拖延，實際工資更遠落在物價後面兩倍或兩倍以上了。工人生活的苦況，在這裏用不着詳細的描畫，就可想而知了。

在慢性經濟恐慌中，農村破產的農民不斷的流向城市，擴大失業的後備軍；中小工廠經不起通貨膨脹洪流的打擊，先後被迫緊縮或停閉；就是能立得起的大廠，由於戰火的蔓延，也在或多或少或搬遷或遣散。工人階級在這種境遇之下，一肩擔負着生活的重壓，一肩排拒着失業的威脅，嘗受着人間最難堪的辛酸。但工人們並不因此而沮喪，消極，甘向資本家低頭。資本家正在將其恐慌中所遭受的虧損轉嫁給工人階級；就是說加緊剝削榨取工人的勞動，來維持它的生存。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利益是勢不兩立的。工人們在漫長的實際生活中，看清楚了資本家的嘴臉，不但不能放鬆對它

的鬥爭，而且加緊對它的鬥爭。像近個多月來年賞加薪的鬥爭，反對搬廠遣散的鬥爭，以及關廠復工的鬥爭等等，真如雨後春筍的一樣，繼續不斷的發生和進行着。

工人鬥爭，從以往的實踐經驗來看，以在經濟繁榮時期為最具有力量的。在那時候，在業的工人多，失業的工人少，容易團結；同時，資本家獲利多，容易讓步。所以每次工人鬥爭，多會獲致勝利，因而增強了工人的力量，使鬥爭能蓬勃發展。等到經濟恐慌和蕭條時期，工人鬥爭就轉而消沉了。其原因就是那時工人失業多，團結不易，而且生活壓迫得抬不起頭來。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週期恐慌時期確是如此。但今天，資本主義的週期恐慌已經過時，代替它的已是慢性的恐慌了；就是說：恐慌、蕭條之後，不會再有繁榮這一個時期了。那末，在慢性經濟恐慌時期中，工人鬥爭也要一反過去的成規，而另具一種新的形式了。這個新的鬥爭形式，就是在漫長的恐慌行程中，也能掘發起工人階級的團結的龐大的力量。

在今天，工人階級的生活已面臨着一個非常嚴重而悲慘的厄運了。這厄運無論在國民黨反動的統治下，或共產黨勞資兩利的統治下，都不能完滿的解決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糜爛到如此程度，再不能在某一較落後的國度裏起死回生了。只有工人階級起來，把它推翻，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制度，才有出路。但要做到這點，在眼前第一步就應先建立新的鬥爭形式。這新的鬥爭形式是怎麼樣呢？簡要的說就是在業工人之間與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要團結起來，共同去從事鬥爭；有工大家分攤做，工資不減；中小工廠要緊縮或停閉，或大廠要遣散或搬遷，工人們就堅決起來反對，並進而自己管理工廠，不讓資本家干涉。只有這樣，才能掘發工人階級的團結的龐大的力量；也只有這樣，才能把眼前個別的零星的經濟鬥爭，擴展成為同盟罷工，以至於政治鬥爭。不過在這中間，覺悟的工人，尤其是革命的工人，要負起更多的酵素和凝結劑的作用。沒有這個酵素和凝結劑，這種新的鬥爭形式是很難完滿的建立起來的，在最近個多月來自覺的自發的個別經濟鬥爭中，已大大的表現了工人的鬥爭精神，所缺乏的就是一個酵素和凝結劑了。

工人們！覺悟的工人們！快快走上革命的道路吧！未來的世界只有經過工人階級的手才能建造起來的。

一月十九日

中共軍事勝利的原因與意義

嚴鳳岡

幾個月來中共在軍事上獲得了非常的勝利，使許多人驚惶失措，又使某些人頭昏目眩了。從極右的反動派到一些最左的革命者，都把這個勝利看成了奇跡，從而找出好些莫明其妙的原因來掩蓋自己的驚惶。有一個一致的說法，流行於反動派之間，用以解釋中共勝利的，那便是『蘇聯的援助』。這些先生們不久之前尚以為中共之消滅只不過等於『開割一次膏腸的』，因為他們完全迷惑於源源而來的美援，可是現在，他們却同樣完全地忘記了這個美援對他們所曾起過的作用，而將對方的成功統統歸之於『蘇援』了。

這些被歷史注定了沒落的政客們的頭腦如此昏聩，原不足怪的。可怪的倒是另一些，自稱為『革命共產主義者』的人，竟也拾取了這樣的論據！

這一些人就是以犀照為首的一個派系。他們爲了史大林派的軍事勝利，於去年十一月間通過了一個決議。牠『修正了過去某部分』的『錯誤見解，即從來否認中共有任何勝利可能的見解，同時指出了他們過去所以錯誤的原因，祇爲了他們沒有『特別重視兩個新因素』，即沒有重視中共『得到蘇聯移交的大批日軍武器以及蘇聯直接所給予的新武器，特別是重武器』。

他們簡單忘記了，蔣介石得之於美國的武器，比中共得之於日軍或蘇聯的要多到，新到，乃至重到無數倍的，可是，蔣介石的軍隊却悲慘地被打敗了！可見犀照的『新因素』是不能解釋中共之勝利的。

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農民不能在政治上起獨立的作用，牠如果不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便不能進行革命至於勝利。這真理，中外一二百年來農民戰爭的歷史已充分加以證明了。但是根據着這個真理，某些『革命共產主義者』却做出完全錯誤的結論來，他們說，中共率領的那支農民軍隊是不能獲得任何勝利的。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非但與上引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不同，而且也爲中國本身的歷史所否定。中國數千年來改朝換代的歷史，就是一部農民暴動勝利的歷史——雖然這些暴動勝利的

故事總不變地以新地主階級的成立與篡竊爲其結尾的。而這些『革命共產主義者』却不肯看看這些經驗，三年來固執着上述這個錯誤意見，並且焦急地期待着中共的失敗來證實自己的『遠見』，抓住國民黨的每一個勝利來誇耀『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可是結果，中共一個空前的大勝利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終於不得不承認爲勝利了，但因而張目結舌了，惶惑不解了，但爲了『理論家』的顏面起見，又不得不有辭以辯之的，於是唯武器論的『新因素』被發明了。

可憐這些『理論家』們呀！

我們和他們相反，我們早就指出了中共軍事勝利的可能，同時指出那勝利的意義。在過去二年餘論到內戰的各種文字（主要是『新旗』的社論）中，我們曾不斷指出：中共在軍事上可以勝利，不過其勝利絕不等於革命的勝利。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毋需抄襲『革命共產主義者』的發見，我們不會見中共之臨近勝利而慌張失態的。

爲使革命的社會主義者與工人們不至迷惑於史大林黨的軍事勝利，不至因此動搖了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信心與遠景，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必須承認中共軍事勝利這個事實，同時冷靜地分析與理解這個事實。

中共的軍事勝利不但出乎牠敵人的意料之外，甚至也超出了牠的領導層的原來預計（自然也超出了我們的預計）。爲甚麼呢？這因爲中共勝利的原因，由於中共主觀方面者少些，由於客觀方面者多些。自從抗戰結束以來，中國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樣，甚至比他部分更加明顯些，民衆對於統治制度發生了一種不能忍受的情緒，由此造成了一個可以稱之爲革命前期的局勢。這種局勢，表現在各個被壓迫階級的鬥爭上，特別表現在工人貧農與學生的鬥爭上。此一局勢未能轉變成真正的革命，首先乃因爲中國史大林黨的反動政策與反動作用。左傾的羣衆趨向於這個掛着革命招牌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則利用了這個傳統的威望使左傾羣衆繼續相信對國民黨的『協商』，相信美國『友誼』的干涉，相信『民族資產階

級」政客的壓力，總之，「共產黨」叫羣衆相信妥協的而非革命的道路。結果，錯失了戰後第一個最有利的革命形勢，美國與國民黨在充分佈置之後，對那團集在中共周圍的農民隊伍進攻了。不過國民黨雖然發動了內戰，並因戰爭而實施了一切「鞏固後方」的鎮壓措置，表面上似乎將革命前期的局勢消滅了，而實際則民衆對國民黨統治的惡感隨着戰爭負擔的加重而俱增了。國民黨政府日過一日地處在愈益孤立的境地之中。民衆中的反感與不安反映到國民黨政治與軍事的全部機構，促成了這些機構的內部矛盾，加大了國民黨政權的離心傾向，同時，最嚴重的，渙散了國民黨兵士的軍心，幾乎完全破壞了蔣介石軍隊的鬥志。這情形，自然十分便利了中共軍事上的勝利。

所以中共勝利的第一個與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客觀存在着（或正確些說，存在過而未完全撲滅的）革命前期的局勢。中共的反動政策不能與不願領導這個局勢去進行革命，因而被逼走上了戰爭，但這同一局勢仍然幫助了中共戰爭的勝利。這情形說明了中共勝利的理由，同時也說明了此種勝利的意義。一個革命黨如果不能從這一角度看問題，則不是將牠看作簡單的「軍事冒險」，則就會錯誤地稱之爲「革命戰爭」。前後兩種看法是同樣有害於革命的。

中共勝利的第二個大原因，乃是牠從前年春季以來，尤其是在十月之後所採取的土地改革。不管這改革是如何地不徹底與動搖，甚至在今年五月後，這辦法又在「新解放區」停止執行，可是中共因此開放了貧農暴動的偉力，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扭轉了內戰中的軍事形勢，却是一個事實，這事實連蔣介石自己都指出來了。

此外，中共上層爲獲致勝利而玩弄的一切手腕與策略，例如：對資產階級的妥協，對帝國主義的和解，對國民黨內部蔣系以外各派軍人政客的招降等等，則與其看成爲目前勝利的近因，倒毋寧說是牠未來失敗的根源；牠們在表面上雖然加速了勝利的過程，而實際上却不但使中共勝利的意義減退到極小限度，而且連軍事勝利的繼續發展都將因此而成爲十分艱難。至於「蘇聯新武器的接濟」云云，則必須從屬於更根本的社會與政治的原因，才能被考慮的。牠決非獨立能起決定作用的「因素」。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話來概括說明中共軍事勝利的原由：在全國反國民黨的革命前夜局勢中，中共拒絕了革命，但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農民軍事鬥爭。這個說明一方面指出了中共何以勝利，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何以那勝利不等於革命勝利。

不過關於後者，即關於中共勝利不等於革命勝利這一點，人們一定還有許多疑問，所以我們不得不再做一點說明。首先，三年來中國的內戰與歷史上許多次的內戰不同，牠不是革命暴動的延長，而是革命局勢被反動的領導黨所有意敗壞的結果。這一點事實太清楚，諒必容易爲人所接受，不過這就革命與內戰交替的歷史而言的；若就事情的結果言，如果革命的目的在於打倒國民黨，而現在內戰的結果正是打倒了牠。彷彿中共方面的戰爭也就等於革命了。可是這樣的邏輯是片面與十分形式的。並非任何勢力與任何方式的打倒國民黨都是革命。歷史上有太多的例子，一個統治被另一個統治所代替着，却並無革命意義。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上尤其是富於這種事實，每次的朝代更迭都不過是這一姓的奴隸主代替了另一姓的奴隸主吧了。這種都不是革命，而只是以暴易暴。中國歷史上正因爲有的是朝代更換而沒有革命，所以數千年來總陷於走馬燈式的無出路的循環中。此次中共如果終於代替了國民黨的統治，究竟將是又一次的改朝換代呢，還是革命的變動呢？不幸得很，從許多方面看來，我們都祇能說牠是前者而非後者。

易代與革命之間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乃同一階級的兩人或兩部分人的易位，而後者則表示一個代表新階級利益的統治起來替代了另一個代表舊階級利益的政權。

中共現在代表着的階級利益，誠然與國民黨所代表的不盡相同。國民黨所代表的是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共產黨所代表的乃是自耕農與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二黨所代表的利益雖然衝突，但就社會學的範疇說，却畢竟是同一個階級中的兩個階層而已。那是說，牠們都同屬於資本階級的範疇之內。所以中共如果勝利之後，同時又沒有工人階級的革命起來，則在中國前面祇擺着兩個可能的前途：（一）牠的妥協傾向完全勝利，在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系殘餘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這個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黨及其政權，完全回復到「正常的」資產階級統治，即目前蔣介石政權之再版

；(二)牠的史大林主義的『革命』傾向勝利了，逐漸消滅了私人資本主義，將主要經濟集中任國家之手，形成國家集體的資本主義，將中國造成一個『東歐國家』。這兩種情形，都不能代表中國工農的解放，因之都不是中國的革命出路。

因之，不論從社會經濟意義說，甚至從工人貧農的政治地位說，如此這般的中共勝利，乃至其可能的代替國民黨政權，都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

內戰與革命

毛澤東以一月十四日的『八個條件』回答蔣介石元旦文告以前，中國共產黨曾以另一種態度對付國民黨底求和，這就是乾脆不理會國民黨政府底和談建議。新華社社論解釋這最初的態度，說道：『革命不能停止在半路上。』

我們在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下過生活的人，很難接觸到中共底宣傳，雖然也曾獲得一些秘密的刊物，也曾經過國民黨出版檢查後的消息知道一點中共底言論。就我們所知而言，中共此次明白拿『革命』做號召，明白拿『革命』之名拒絕與國民黨商談，是比較新鮮的事情。

我們歡迎這句話：『革命不能停止在半路上。』我們深深希望：此次統治了中國二十二年長久的國民黨政權之推翻，將是一個革命底開始，或革命中一個重要的段落，而非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我們希望這個革命將不斷發展下去，直至解放了中國全體勞動民眾，直至解放了全世界底人類。

中共雖然明白拿革命做號召了，但我們早就知道，中共所謂革命和我們所謂革命是屬於不同的性質：他們要的是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要的則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點不同，我們說過很多次了，我們不願在此地重覆我們和中共之間這一個重要的理論分歧。此地，我們要提出來討論的，是關於革命的另一個問題，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就是說：在我們看來，真正的革命，名實相符的革命，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或是『新民主主義的』，或是舊民主主義的，

如何才能避免這個不祥的命運呢？只有照着我們一向所指出的發展：城市工人階級及時起來，與暴動的貧農攜手，打到國民黨，拋棄史大林主義的反動控制，建立工農政府，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一切雖然是我們的老話，但牠確實是中國唯一的得救之道！

一九四九·一·二十日

舒嚴

義的，必須是自下而上的運動，即必須是以廣大羣衆自發運動為主體的運動，這廣大的羣衆首先是城市的羣衆，尤其是城市中貧苦的羣衆，在中國現時的情形下更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可是，在他們看來，即是從我們所能獲知的中共言論看來，恰好相反；這個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是不須羣衆自發運動的，至少不是以城市廣大羣衆為主體的。中國共產黨，解放軍以及解放區底人民政府，好像是羣衆以外，站在羣衆頭上的一種權力，純粹藉軍事的行動去推翻國民黨政權，現在以戰勝者資格，不僅對於反動的黨派發號施令，而且對於羣衆自身，連無產階級在內，也發號施令。

這樣的『革命』果真是革命麼？不錯，歷史上有好幾次『革命』是這般進行的，例如中國的辛亥革命。但名實相符的革命不是這樣的。

中共稱此次打敗國民黨的內戰為『革命』，可是奇怪得很，在這個『革命』中，中共竟拒絕採用一個重要的武器，即大城市羣衆運動，尤其工人運動。我們試比較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更加顯出奇怪。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首先是城市廣大的羣衆運動，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運動。我們有上海五卅大罷工，有廣州和香港空前的大罷工，有漢口，天津，以及一切像樣的城市底廣大羣衆行動。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從這一羣衆運動中強大起來，領導了這個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國共兩黨合作的廣州政府也在這一羣衆運動中強大起來，組織牠的軍隊，擴展牠的影響。北伐軍出發途中

，湘鄂贛諸省農民羣衆紛紛起來，農民不是以「參軍」的形式支援北伐軍，主要地是在軍隊以外支援北伐軍。已有羣衆運動的大城市，看見北伐軍臨近時，便準備暴動來響應。杭州和上海，便是正式軍隊未到前，就由暴動的工人從北洋軍閥手裏奪取下來的。上海工人一共進行了三次暴動，至第三次才成功了。城市的工人和鄉村的農民，又以其廣大的運動支持國民政府和北伐軍中的左翼，即中國共產黨及其同盟人，而反對右翼，即後來二十二年統治中國的蔣介石政權。這次革命雖然半路失敗了，但確能當「革命」之名而無愧的。可是現在呢？我們沒有看見城市羣衆運動，更奇怪的還是若干大城市如濟南，長春，瀋陽，天津等等，「解放」時都不是本城羣衆自己起來解放的，羣衆連這個企圖都沒有。更奇怪的又是中共及其解放軍也未曾有在大城市領導和組織羣衆暴動之企圖。

這是爲了甚麼呢？二十二年中國無產階級能夠舉行暴動響應北伐軍，難道現在退步了，不能夠舉行暴動響應南伐軍了麼？不是的。這二十二年來，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和經驗上都有進步，更加有暴動能力。

或者統治城市的國民黨政權，比較當時的北洋軍閥政權更有經驗，更能夠控制城市工人羣衆麼？也不是的。不錯，國民黨政權更有控制力，但這點不能完全解釋城市沒有廣大羣衆運動和武裝暴動。濟南等等大城市，現在已不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了，但何嘗有羣衆運動呢？

說實在話，現在所以沒有羣衆暴動響應解放軍，乃是因爲中共本身害怕這個暴動。中共不僅不去組織牠，而且阻止牠的自發。此外中國又沒有一個革命黨在解放軍內代表真正羣衆利益，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共產黨那樣。失去了領導，暴動就難於發生了，即使羣衆自發起來，也是很容易流產的。

從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共，這中間經過了甚麼性質的發展呢？起了甚麼變化呢？是進化呢，還是退化呢？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

現在的中共，仍同二十二年前的中共一樣，自命爲中國無產階級底黨，自稱爲代表中國工人利益。可是，我們分析牠的政策和行動，發現牠並非如牠所自命和自稱的。這個情形，自從牠攻佔了大

城市以來，更加明顯了。牠攻佔了大城市，直接同工人羣衆相接觸，於是牠的階級性就容易辨別了。中共已有機會歸納牠統治大城市的經驗了。我們讀到了牠的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先生一篇文章：名爲「發展工業的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從著者的地位和文章底內容看來，這篇文章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做判斷中共之根據的。

首先要說的，是著者底超階級的態度，他彷彿站在資本家和工人以上向資本家和工人雙方說話，而非站在工人立場向資本家說話。文章題目已經很奇怪了。在中共宣傳部副部長筆下，勞動竟成了一种「政策」，與稅收並列！他一面對工人說：你們的工資不能過高了，否則資本家要破產；一面對資本家說：你們付出的工資不能過低，否則工人做工沒有勁。

其次，他不是號召工人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直至完全肅清資本主義而後已，他是要工人努力生產，替公營工廠和私人工廠掙錢。他最關心的，是要工人改變過去的「勞動態度」，而「建立新的勞動態度」。他認爲過去，在日本和國民黨統治下，工人那種「磨洋工」的態度是要不得的，例如大小便拖延時間，聽到氣笛聲不趕去上工之類。他要求，「解放後」，工人，過去八個人抬一根鐵軌的，現在則四個人抬；過去二百人一天修六百米道路的，現在則修一千五百米，甚至三千零五十米道路等等。他說：「解放區的職工運動和工會工作，應該在上述工人們建立新的勞動態度的正確口號之下鼓勵工人們生產的積極性。」

工人應當努力生產，工會應當鼓勵工人生產，但工資呢？工人一般待遇呢？說到這裏，陳伯達先生首先「堅定地反對過份提高工資及破壞生產的左傾冒險主義」。他說，「過去某些老解放區有過這樣的錯誤情況，即脫離那裏的一般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忽視工廠的具體條件，因而提出過早的勞動條件，過份地提高工資，使得工人們過着特別優裕的生活。」他認爲如此就會使工廠關門，又會使工人和農民及其他社會分子「發生生活上的互相歧視」。你看他爲了反對工人底高工資，竟說出這樣一篇大道理來！他雖然也反對工資過低，但這是陪襯的話。

「正確的工資政策」，據陳伯達先生說，「應該是根據當地當時的一般生活條件，（下接第四頁）

中國革命悲劇

(續)

Harold R. Isaacs 著
唐 盛譯

第五章

廣州：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變

蔣介石守衛着他的階級底利益，好像神話中的三頭獸色伯魯斯(Cerberus)守衛着陰司大門一般。色伯魯斯底一顆頭向右看，面孔像戴季陶。戴季陶此時已成爲廣州國民黨保守派底理論領袖了。他是上海及北方公開的右派和廣州暗藏的右派之中間環。他任道國民黨首都如此能活動，如此有影響，這已足夠駁斥那種膚淺的分類法了，即僅僅根據是否贊成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來分別國民黨左派和右派。這個過分簡單化的分類法，是鮑羅庭及其隨從所喜歡的，正如他們喜歡於廣州鬱悶的夏季喝一杯冰忌淋那樣。在太陽光照射之下，冰忌淋不久就溶化了；同樣，在階級鬥爭光輝照射之下，政治幻想物也是容易消散的。表面上看，兩個政治傾向之間有深刻的分歧，事實證明那不過是同一集團底兩部分間一種分工罷了，這個集團根本上是一致的。北方的右派乃是廣州「左派」藉以同列強妥協的一座橋樑。早於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時候，戴季陶就在廣州開始替左右兩派聯合清除道路了。

在蔣介石暗中保護之下，他開始印行反共產黨的和反馬克斯主義的小冊子。他宣布，一國人民中「先知先覺」的部分有天賦權利去指導和統治「不知不覺」的部分，而共產主義和孫文學說並無共同之點。他大聲疾呼叫人起來護衛先總理的學說，免被共產黨曲解附會了去。他經過「孫文主義學會」大膽進行組織工作。孫文主義學會很小心地叫人注意他們和北方西山會議派不同，據說不同的有如下三點：(一)西山會議派是反對一九二四年改組的，他們則擁護這改組；(二)西山會議派是腐敗反動的官僚及無政府黨組成的，他們則是積極的革命者；(三)西山會議派底目標：是推翻汪蔣，他們則奉汪蔣爲領袖。但他們雖屬於左派，仍是積極而堅決反對共產黨的，同西山會議派一樣。他們也要同共產黨決裂。」(見湯良禮著的「內史」第二三一頁)

色伯魯斯底第二顆頭向左看，面孔更像蔣介石，但滔滔不絕說些忠實於革命的話。「我也願意埋葬在這些烈士底墳墓旁邊的，他們爲了國民革命，爲了三民主義，爲了共產主義，而犧牲生命。沒有總理的三民主義，就不能實行中國革命；同樣，沒有共產主義，也就不能實行世界革命。我們不能否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個部分。三民主義的實現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既然我們不能將中國革命從世界革命分離出來，那麼我們中間爲甚麼要爲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而爭吵呢？」(見「黃埔年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廣州出版。)

色伯魯斯底第三顆頭則居中而向前看，緊緊護持着新萌芽的野心。蔣介石從左邊聽到了自己的聲音，說共產主義和孫文主義是二而一的；他從右邊聽到了戴季陶底聲音，說這兩種主義中間有不可消除的矛盾。他從左邊得到聲望和羣衆擁護，得到俄國軍火，金錢和顧問；但製造他自己的機器零件所用的材料，則是從右邊得來的。他很嚴格地祇任命非共產黨員擔任重要官職。建立這個十分「純粹」的國民黨政治機構時，蔣介石得到了那個文弱書生汪精衛底完全合作，——這是小資產階級急進派底領袖，命運注定永遠在更強硬的大資產階級盟友手中供人玩弄的。

好多有名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做中央執行委員，但沒有一個能做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雇用了許多俄國技術顧問，軍隊政治部大多數也是共產黨員佔支配地位，但參謀部和軍需處，則嚴格屏除共產黨員的。國民政府本身沒有共產黨員，祇有鮑羅庭做顧問；但在羣衆團體中以及黨和政府下層機關中，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則負荷日常工作底重擔。國民黨左派就是從他們吸取力量的，因此才能支配了一九二六年一月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大會上，階級利益衝突和個人衝突被羣衆運動底蔭影所遮蓋了，雖然是薄薄地遮蓋着。全國有組織的工人達到八十萬；廣東一省農民協會發展了六十萬以上的會員；香港因罷工而麻痺了；在

廣州，糾察隊巡邏街道和碼頭。資產階級代表還新鮮記得廣東全省統一之教訓，明白他們需要這個羣衆為武器以對付即將到來的鬥爭。他們高興通過一些議決案，重述他們以前不很樂意地說過的諾言，以及關於國民黨「工農政策」一類好聽的話。他們向色伯魯斯第一頭皺眉，即溫和譴責戴季陶底反共宣傳。他們向色伯魯斯第二頭微笑，即選舉他本人第一次做國民黨中央委員，他當場接受了，而且很恭敬地高呼：「聯合蘇聯，聯合世界革命」。（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國際通信」）但大會對於色伯魯斯第三頭頗為冷淡，因為大會上最高的人物是汪精衛，他是黨和政府的首長，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的所有職位都是蔣介石所企望的。

蔣介石早已自命為孫文門徒中的首領了。廖仲凱被刺死和胡漢民被罷免之後，祇留下汪精衛同他競爭這個地位。那時他不過是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和第一軍軍長，汪精衛則是黨和政府底首長，不僅行使最高政權，而且以軍事委員會主席資格代表政府監督軍事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依附於廣州政府的其他軍長，在政治權利和物質利益之分配上，尤其在軍火分配上，享有與蔣介石同等的地位，而這是蔣介石所不能忍受的。二月間，俄國代表團款宴國民黨領袖們席上，有一位俄國軍官舉杯祝飲，致辭中把汪精衛姓名置於蔣介石姓名前面。當時同席的一個人說，蔣介石聽了，就變了色，緊閉着嘴唇，「那天晚上就不再說一句話了。」（見李之龍著的「汪主席底辭職」）蔣介石非常妒忌汪精衛各方面的優越地位，而資產階級也曉得怎樣去利用蔣介石底虛榮心。國民黨右派那些老幹部早就明白他們經過蔣介石可以奪回黨內領導權了。在戴季陶幫助組織的西山會議上，他們就採取了「聯蔣倒汪」的口號，當時蔣介石公開責斥這個口號，但暗中贊同着。當一九二六年一月右派在上海開大會，反覆向蔣介石作此建議時，蔣介石就更傾向於接受了。「左派」表面上雖然得到勝利，共產國際雖然從莫斯科來慶賀「國民黨已成為一種堅決的戰鬥力量，已成為真正的中國革命黨」（見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際通信」），但右派底影響已能在廣州明顯看出來了。

一個敏銳的中國通信員從廣州寫來報告道：「國民黨右派或反赤派，總部設在北京和上海，……但在南方首都較不急進的國民黨

員中也有不少的支持者。蔣介石將軍及其他同志已有此感覺了。」（見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密勒氏評論報」）這個影響再不是間接傳來的了。青年將軍的恩人張靜江親自南下，來看看他的投資有無出息。他參加了蔣介石底親信集團，而且成了蔣介石主要的政治助手和顧問。

現在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張靜江所勸告於他的受恩人去征取的，就是如何保障資產階級對於日漸增長的羣衆運動之領導權。必須保證羣衆運動不會超出資產階級利益範圍以外。為這原故，具體地說，必須鞭撻共產黨員就範，規定他們祇能做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助手。總而言之，現在已經到了那麼一個時候，必須裁減共產黨員底政治工資，為的增加資產階級底政治利潤，為的將羣衆運動所積累起來的巨大資本交付資產階級去調度了。這是穩定上層領導的問題。為此必須給共產黨員及其小資產階級急進派盟友一個重大的但非致命的打擊。廣州那個政客軍閥集團所以相互陰謀召致分裂，祇因為好多人爭着施行這個打擊。感謝鮑羅廷，蔣介石現在處於有利的地位了，他決定行動了。

帝國主義者直接影響右派，並經過張靜江和孫文主義學會去影響蔣介石。他們的願望恰恰符合於他的野心，他的狡詐，他的妒忌政治敵手和軍事敵手，他的明顯的權力慾。壓制共產黨員，就是替資產階級爭得羣衆領導權。排擠敵手，就是替自己爭得施行此領導權的最高地位。這個圖案中各種顏色的線條迅速糾結於一處了，現在等待蔣介石來解開這個結，以此造成新的圖案。他於是十足成了馬克思說的「那樣一個人，他不是夜裏設計日裏行事的，而是日裏設計夜裏行事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天亮以前幾個鐘頭，蔣介石底軍隊出動了。藉口是說夜裏停泊在黃埔附近的炮艦中山號有甚麼敵對的態度。那夜的事情是把好多複雜的陰謀線索聯繫在一起的，這些線索太過於曲折了，其中包含着好多以國民黨英雄自命的人底相互衝突的意志，我不能在這裏詳說。（海軍局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不知不覺成了那夜事情的主要目標，曾在一年後出版於武漢的小冊子「汪主席的辭職」中記述這個故事底一大部分。）可是，到了蔣介石有系統地進行他的計劃時候，那些英雄都被掃除到旁邊去了。蔣介石

屬下軍隊中所有的黨代表，約五十人，都被逮捕了，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機關都被解除武裝了。在廣州的俄國顧問都被軟禁了。繼廖仲凱做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共產黨同情者，被拘留了。這一切的人都是睡夢中被捕的。李之龍就是一個，他被人從床上拖下來，用車子裝到軍人監獄去。天色微明時，蔣介石就做廣州主人了。此時，其他的國民黨領袖頭腦完全糊塗了。所有的人『都出乎意外，連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這件事情』，——一位共產黨歷史家這般說。（見華崗著的『中國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節）每個人都是慌張失措的。

國民黨中央委員趕急集會。他們在一個決議案中居然敢說：『蔣介石既然是一向為革命而鬥爭的，我們希望他會明白他在這件事情上犯了錯誤。』可是他們決定，『在現時局勢之下，左派同志只有退讓。』（見『汪主席辭職』）在汪精衛看來，這話就是要他下野之意。他很恰當地害了病。他的傳記家記載道：他『認為解決現時局勢的最好辦法，就是他下野，而讓蔣介石暫時負責。』（見『內史』第二四六頁）他在造幣廠將印信當面交給蔣介石，演了這齣醜戲之後，他就離開了，起初到廣州郊外一個鄉村去，數日之後就到歐洲去了。出國前，他寫信給蔣介石，請求他勿離開『革命』道路。『果能如此，汪精衛便犧牲自己也無所謂了。』（見『汪主席辭職』）

國民黨『左派』如此容易屈服，因為蔣介石突然襲擊他們時候，真正的左方，即有組織的羣衆，並沒有甚麼反應。羣衆糊塗了，完全不知道上頭發生了甚麼事情。一個外國觀察家幾日之後來到廣州，很快活地看見共產黨員躲藏起來，而俄國顧問在收拾行裝。（見索可斯基著的『亞洲火絨盒』，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第三三六頁。）可是，蔣介石本意還不要直接打擊羣衆運動。他祇想把羣衆運動置於資產階級控制之下，而集中這個控制權在他自己手裏。他成功趕走『左派』諸領袖以後，就來向工人解釋了。他告訴工人說，三月二十日的事變，尤其擾亂罷工總部的事情，是出於『誤會』，他答應要懲辦負責的官員。共產黨員自己頭腦如此糊塗，竟不知道信他好，還是不信他好。

從此以後，右派政客紛紛從香港和上海來到廣州了。以前他們

是站在外面旁觀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五月十五日開全體會議。這個日子臨近時，全城籠罩着一種有意造成的屠殺氣氛。牆上貼滿了佈告，叫人們當心神祕的『挑撥』；街上傳播了謠言，說共產黨就要暴動推翻政府。中央銀行擠兌。開會前一日，忽然宣佈戒嚴。除了蔣介石心腹以外，沒有一個人猜得到要發生甚麼事情。（見『汪主席辭職』）

會議開始時蔣介石提出而且迫得通過一個特別的決議案，『整理黨務案』。其中限制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底組織活動於最狹小的範圍，不許共產黨員『對於總理及其主義有任何懷疑或批評』，要求共產黨將跨黨黨員名單交付於國民黨常務委員會，規定省市及中央黨部共產黨員僅能佔據三分之一委員位置，禁止共產黨員充任國民黨各部和政府各部的部長，禁止國民黨員『加入任何其他政治團體或從事任何其他政治活動』，——這就是說，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員不可以加入共產黨，否則要喪失國民黨籍，——要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凡轉給該黨黨員的一切訓令都須先交兩黨組織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批准。

蔣介石把共產黨員套進這個政治的緊身馬甲之中，一面就進行集中一切權力在他自己手裏。三月二十日的政變已經摧毀軍事委員會的權威了，汪精衛底下野又讓蔣介石獨手控制黨和政府底一切事務。五月十五日的全體會議正式承認了這些變化。蔣介石正式被舉為黨底首領，他立即委任張靜江代表他做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北伐計劃也通過了，蔣介石又被任命為一切北伐軍的總司令。因此又有一連串的命令賦予蔣介石以緊急權力，直至北伐終了為止。政府和黨一切機關都隸屬於總司令部。軍事委員會，本是文政方面藉以防止軍人野心的，現正也完全落入蔣介石手裏了。他成了政府財政底支配者。他控制政治部，兵工廠，參謀部，陸海軍校學。廣州政府變成了軍事獨裁。蔣介石得到完全勝利了。

此次，蔣介石在廣州沒有流血奪得政權，遂確立了資產階級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列寧曾警告落後國共產黨，要他們出全力鬥爭，反對資產階級控制羣衆運動，——現在中國正有這樣的控制了。克臨靈宮那些負中國革命運動責任的人，常常拿死的列寧做香料來塗抹活的列寧。（完末）

我們的政治主張

- (一) 反對國民黨勾結美國帝國主義討伐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隊；——反對徵糧，徵兵，徵稅！立即停止內戰！
- (二) 徹底改善與保障工人生活：——按生活指數十足發給工資；職工代表自編生活指數；八小時工作制；工會領導機關民主化；反對國民黨棍控制工會；工人管理前敵偽工廠；工人監督「國家銀行」與「國營事業」；救濟失業；確保罷工權；取消一切反對勞動者的法律！
- (三) 沒收土地歸貧農：——切實沒收地主與富農土地，由全體自耕農，貧農與僱農組織土地委員會加以管理，由各成員分種或集體耕種；打倒高利貸；取消一切苛捐雜稅！
- (四) 軍隊民主化：——一切軍隊（不分國共）立即成立兵士委員會；徹底改善兵士生活；廢止一切等級、特權，壓迫與侮辱；革斥全體反動軍官；兵士自選指揮員；授退伍兵士以土地；廢止常備軍；由工會編練工農民軍！
- (五) 保障貧民生活：——成立各類消費者代表會，規定日用品價格，監督一切經濟活動，懲罰投機囤積；成立住戶聯合會，分配一切房屋；由國庫廣建房屋，交工會與住戶聯合會支配；清算並沒收大官僚，一切發國難財，勝利財與內戰財者的財產，用以整理幣制，安定物價，興建工廠，由工人管理，以此切實救濟貧民；以單

一的財產累進稅代替一切捐稅；革斥一切貪官污吏，官吏民選！

(六) 保障青年的求學與就業：——增加教育經費；大中學生一律公費；實施普及的義務教育；反對黨化教育；保障教師生活與學生營養；畢業學生有充分就業機會！

(七)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請願，罷工，糾察完全自由：——立即取消一切特務組織；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廢除保甲制和警管區制；切實保障各種自由！

(八) 保證中華民族之對外獨立與對內自治：——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反對美軍駐華；取消中美新不平等條約；否認一切外債；實行自主的保護關稅；沒收外商在華產業；讓臺灣人自治；保證國內諸小民族的完全平等與自決！

(九) 保衛蘇聯，打倒史大林官僚政策：——反對充美國帝國主義貓爪進攻蘇聯；反對恢復沙俄特權的「中蘇條約」！

(十) 與世界工人階級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撤退一切佔領軍；反對鎮壓殖民地獨立運動！

(十一) 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取消一黨欽定的憲法；取消一黨政府；反對各黨派上層談判改組政府；反對領袖協商的「聯合政府」；主張由全體人民以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普選全權的制憲會議，產生工農政府，實行上列政綱。

▲新旗叢書▼

托洛次基自傳

何偉譯

(基本價) 三圓

十月教訓

托洛次基著 唐盛譯

一圓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次基著 凡西譯

五圓

俄國革命史(再版)

托洛次基著 凡西等譯

十圓

不斷革命論ABC

意因著

一圓

不斷革命論與中國革命

意因著

一圓

惟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五角

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宣言

五角

▲新書預告▼

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重要決議

托洛次基最後論文和書信

不斷革命論

過渡綱領